



10

制图：安宁
版式设计：纪安静
责任编辑：高玉璞
执行主编：张敬东

2025年
4月8日
星期二

内蒙古日报

北疆文化·文物说



【出圈】呼和浩特博物院一级文物

【自白】

巧夺天工鹿跃然

□本报记者 高玉璞

那是个天气微凉的清晨,山里的雾还未散尽,露水顺着山岩滴落。躺在矿脉深处的我不知已经沉睡了多久。“师傅,您看,这好像是块墨玉!”一个清脆的声音惊醒了我。接着,一双老茧密布的手轻轻拂去我表面的尘土,我感觉到这双手因为激动有些颤抖,耳边传来苍老而慈祥的声音:“这可真是一块好玉石,不仅硬度高,而且光泽温润。”

阳光透过薄雾洒在我身上,我感觉到自己通体墨绿,温润如水的肌肤上有了丝丝暖意。

我被这对师徒带回到摆满了各种工具,空气中弥漫着玉石粉末气息的作坊。老人将我放在工作台上,我感觉到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流连。

“你认真看、仔细学,我要把这块玉雕琢成充满祥瑞之意的作品。”老人对徒弟说。

雕刻开始了。第一刀落下时,我感受到的不是疼痛,而是一种奇妙的蜕变。老人的手虽然粗糙但是很稳,刻刀在我身上游走,勾勒出5只鹿的轮廓。“鹿是很有灵性的动物,它能与天神交流,也象征福禄寿喜,所以线条要流畅,要让人感受到鹿的生机与活力。为了突出鹿的立体感,得用高浮雕手法,一会儿你仔细看我刀尖的起落……”老人耐心地向徒弟讲解着。

刻刀继续在我身上游走,每一刀都恰到好处。老人的呼吸很轻,心跳的节奏沉稳而有力。最后一刀完成时,老人长舒一口气。我能感觉到他的疲惫,但更多的是满足。他将我举到阳光下,我看到了自己的模样——5只鹿被老人手中的刻刀分为左、右、中3组,左右各2只鹿,昂首挺胸,双双望向对方,眼神中透着灵动与机警,中间的小鹿仗着有左右两组鹿的庇护,调皮地向“观众”展示它的短尾巴。

每一只鹿的雕刻线条都流畅自然,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北魏鲜明的玉雕特点。“完美!”老人的声音中透露着欣慰。他对徒弟说:“这是我迄今最得意的作品。”



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五鹿同春瑞气盈

□本报记者 高玉璞 通讯员 斯钦布和



鹿纹图案

从汉代开始,鹿被视为连接人间与仙界的灵兽,受此影响,北魏时期常见“仙人骑鹿”之类追求永生寓意的图案。

五鹿同春玉牌

长27厘米,宽13厘米,厚2.09厘米,重1965克。



“鹿”谐音“禄”,虽然这个美好的寓意在唐宋以后更明确,但北魏时期可能已经有这种萌芽,因为鹿的形象常出现在贵族使用的器物或官署装饰中。由此可见,北魏时期“鹿”的寓意多元而交融,体现出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交汇的独特精神风貌。



(本版图片由呼和浩特博物院提供)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由北方游牧部落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发展历程波澜壮阔,充满了传奇色彩。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定国号“魏”,史称“北魏”;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迁都洛阳。

北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改汉姓、穿汉服、通婚等措施,采取了一系列文化整合举措。这些举措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架起彩桥,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让不同民族在交往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知,培养了民族情感。

呼和浩特博物院珍藏着一把开启北魏历史文化宝库的“钥匙”——五鹿同春玉牌。该玉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征集于民间,201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玉牌玉质温润细腻,承载着岁月的温柔抚摸。整体土沁为褐色,宛如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诉说着它历经的沧桑变迁。土沁是古陶瓷或古玉器在地下长期埋藏过程中受到周围土壤中各种矿物质、有机物及水分等因素的影响,在器物表面或内部产生的一种色彩变化或斑点状的沉积现象。

五鹿同春玉牌长27厘米,宽13厘米,厚2.09厘米,重1965克,形状规整典雅。玉牌上高浮雕刻绘着5只鹿,左右各2只,两两相对,守护着中间反立的小鹿,形象生动逼真,仿佛随时会跃出玉牌,奔

向密林深处。

高浮雕是雕刻艺术的一种形式,特点是起位高、厚,层次变化多,形体压缩程度小,塑造的形象立体生动。高浮雕不仅是北魏时期艺术的表现形式,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常雕刻有龙纹、凤纹、兽纹等具有文化意象的纹样,凝聚着工匠的智慧。

呼和浩特博物院陈列研究部副主任斯钦布和向记者介绍:“通过五鹿同春玉牌,我们看到北魏时期丰富的雕刻技法,有阴线刻、浮雕、圆雕、透雕等。这些技法犹如艺术家手中的魔法棒,赋予了玉石新的生命。五鹿同春玉牌上雕刻的鹿线条流畅自然,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每一道线条都恰到好处地勾勒出鹿的神韵与轮廓,这是北魏玉雕技法的特点,传递着时代的历史信息。”

鹿在北魏的文化艺术中具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既融合了中原文化的传统观念,也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汉代开始,鹿被视为连接人间与仙界的灵兽,受此影响,北魏时期常见“仙人骑鹿”之类追求永生寓意的图案。鲜卑起源于草原,鹿是他们狩猎生活中的重要动物,鹿角、鹿皮等元素在鲜卑服饰或器物装饰中常见,既是实用资源,也是勇武与自然力量的象征。

呼和浩特博物院副院长张静说,“鹿”谐音“禄”,虽然这个美好的寓意在唐宋以后更明确,但北魏时期可能已经有这种萌芽,因为鹿的形象常出

现在贵族使用的器物或官署装饰中。由此可见,北魏时期“鹿”的寓意多元而交融,体现出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交汇的独特精神风貌。

北魏的玉雕作品多以牌饰、带板、带扣、杯、碗等形式出现,不仅实用,也是当时人们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体现。五鹿同春玉牌属于牌饰,以独特的造型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在众多玉雕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北魏玉雕艺术的稀世珍品。

北魏中后期,玉雕风格逐渐与中原玉雕文化融合,承袭了两汉玉雕风格,这可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传承中创新,有自己独特的韵味。此时的玉雕大多光素无纹,清俊素雅。这种风格的转变,不仅是艺术审美上的变化,也是北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生动体现。它见证了北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从而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的历程。

“五鹿同春玉牌仿佛是一位历史的使者,向世人讲述着北魏的故事。作为北魏历史文化的珍贵遗存,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艺术性,更体现在历史、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它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更是一件承载着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的珍贵文物。它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古代玉文化的魅力,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北魏时期玉雕工艺、审美观念、文化习俗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斯钦布和说。

【观点】

文化融合的瑰宝

□张静

北魏时期,玉器多采用地方玉,有青玉、青白玉。五鹿同春玉牌选用的玉料硬度较高,质感温润,带有自然的绺裂,这些特征为玉牌增添了独特韵味。玉料尺寸较大,就材质本身而言,比较稀缺。

五鹿同春玉牌下方及两侧有清晰的凹槽,由此判断这应该是一件插屏。北魏时期重视文化,贵族和文人有自己的书房,通常会在书房的案几上放插屏,与书籍、文具等相伴,彰显主人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

玉牌上雕刻的鹿形态生动活泼,身体结构匀称,身姿矫健,尤其刻画细腻肌肉线条,体现出工匠精准捕捉鹿的形态的能力,极具写实性。

五鹿同春玉牌采用高浮雕工艺,使五鹿从背景中凸显出来,层次分明,立体感强。鹿的轮廓线及细节线条一气呵成,流畅自然,展现出工匠卓越的雕刻技艺。

画面布局上,5只鹿在玉牌上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既展现出丰富的内容,又保持了画面的和谐与稳定。“五”在古代文化中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数字,常与五行、五福等概念相关联,象征着吉祥、和谐、平衡,“五鹿”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鹿是北魏文物中动物纹饰的重要元素。玉牌上鹿的造型既具有北方游牧部族对自然生物的质朴描绘,又融入了中原文化对玉器雕刻的精细审美,体现出和谐统一的完美融合。

(作者系呼和浩特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史话】

玉韵万年承古今

玉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今已有近万年。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先民就开始使用玉石,最初作为装饰品,后来逐渐认识到玉石特殊的性质,便将其独立出来称为“玉”。

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年—公元前7000年)人类聚落遗址——查海遗址位于辽宁,出土了迄今最早的系统性玉器,其玉玦、玉匕等器物证实了西辽河流域在玉文化起源中的核心地位。这些透闪玉玉器的专业化加工技术标志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为后续红山文化玉器群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起源于距今约6500年前后,大约在距今5800年进入古国文明阶段。红山文化以其精美的玉器而闻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C”形玉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兴隆洼遗址是红山文化的源头之一,出土的玉玦制作技艺与人格玉化观念直接影响了红山玉器的精神内核。还有牛河梁遗址的玉猪龙,以胚胎式抽象造型,展现对生命起源的哲学思考;巴林右旗出土的勾云形玉佩,通过镂空技法塑造流动云纹,印证《周礼》“以苍璧礼天”的祭祀功能。夏家店下层文化见证玉器功能的转型。赤峰大甸子墓地出土玉璇玑,三层旋齿齿牙暗含天文观测智慧。

北魏五鹿同春玉牌,在27厘米的玉料空间里凝聚着多元文明碰撞的火花。“五鹿”造型既延续汉代“天鹿通灵”的传统,又融入鲜卑族狩猎文化的写实基因,插屏形制折射出北魏贵族吸收汉文化过程中的书房雅趣,见证着游牧部族接受中原礼制的创造性转化。

(雷焕 供稿)